

# 二十一世紀評論

## 改良與革命的反思

編者按：本文整理自香港中文大學第四屆「陳克文中國近代史講座」的第二講以及圓桌討論（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辦，2023年4月21日），主題是「社會改良與社會革命：國共競爭下的道路選擇」，講者包括楊天石教授、黃克武教授和王奇生教授。各篇演講內容嗣經修訂後刊出，以饗讀者。

## 社會改良與社會革命： 國共競爭下的道路選擇

楊天石 黃克武 王奇生

黎志添：各位來賓、各位同仁，大家好，我代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歡迎大家參加今天由我們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舉辦的第四屆「陳克文中國近代史講座」。首場講座已經在本周二（2023年4月18日）舉行，在座的朋友如果當天也在的話，已經聽到楊天石教授十分精彩的演講。我們今天不單請楊教授親臨講壇，還請了另外兩位重要的嘉賓——第一位是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黃克武教授，第二位是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王奇生教授。今天下午的演講，講者會各自發揮，此後還有綜合的會談，我相信三位教授精彩的演講與會談能夠交集智慧、激盪思辯，碰出思想的火花。

今天座談會的主題是「社會改良與社會革命：國共競爭下的道路選擇」。三位教授從不同的角度探討國共兩黨的種種問題。楊教授在上次的講座中給我們詳細講述了蔣介石的功過是非，今天他會與我們分享「國民黨從社會改良主義向社會保守主義的蛻化」。

台灣中研院的黃克武教授，我相信在座很多朋友對他也不會感到陌生，因為黃教授經常來到我們中大講學，他的專長領域是中國近代思想史、政治史與知識份子研究，近年來的主要關懷跟我們今天的題目有密切的關係——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的政治理念與政治權威的關係。大家可以聽到他對國共兩黨，以及二十世紀中期中國「第三條道路」的個人觀察與寶貴意見。

來自北京大學的王奇生教授是研究中華民國史、中國國民黨史以及中國共產黨史的專家，他會跟我們分析國共兩黨如何展開合作與競爭。這是今天三位教授不同角度的演講。期盼下面一場精彩的、豐富的演講，我就不耽誤大家的時間。相信大家一定會滿載而歸，謝謝大家。

主持：今天我們座談會的主題是「社會改良與社會革命：國共競爭下的道路選擇」。我們將先請三位教授圍繞這個主題發言，然後由梁元生教授主持圓桌討論，並歡迎台下聽眾提問和參加討論。現在先請楊天石教授發言，他的題目是「國民黨從社會改良主義向社會保守主義的蛻化」。

## 一 國民黨從社會改良主義向社會保守主義的蛻化

楊天石：尊敬的金耀基校長、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專家學者，很榮幸有機會第二次在陳克文講座作報告。

孫中山是革命家。為了拯救中國，孫中山堅決主張以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和北洋軍閥政權。但是在解決資本、土地等社會經濟問題上，孫中山卻是個非暴力的改良主義者。同盟會綱領中的「平均地權」的核心內容是「漲價歸公」，也就是說土地原價歸地主所有，因工業、交通、商業發達所增長的地價歸全民所有，用以改進社會，提高民生。這一綱領承認地主的土地所有權，所剝奪的僅是因為社會因素所增長的地價。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孫中山進一步提出「耕者有其田」，但是他並不主張仿效俄國的辦法，把全國的田土都分給一般農民，而是主張慢慢商量、和平解決，採取讓農民得利、地主也不吃虧的雙贏方案。

孫中山強烈地批判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嚮往社會主義，但是他根據中國的經濟發展程度，只主張節制資本，用和平的、調節的方法解決資本主義發展中出現的矛盾，這是要「發達國家資本」、獎勵私人資本，允許老百姓自由興辦部分企業，通過發展生產力，提高生產效率，實行「社會與工業之改良」等辦法，實現「社會經濟進化」。

蔣介石早年接觸過馬克思主義，表示過欣賞、讚佩之意，他甚至主張，中國的問題在於資本家，只有把資本家殺光了，中國才有希望。但是蔣介石更為傾信的是孫中山思想，特別是其思想中的改良主義成份。蔣介石認為在現階段的中國，只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才適合中國的國情，中國革命必須以三民主義為中心和基礎，三民主義是「盡善盡美唯一最高之革命指導原則」。

1927年2月，蔣介石在和共產黨分家前夕，曾經說過：「民生主義對於土地承認私有制，而共產主義完全是取消私有制。」同年4月，蔣介石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會上講，他和共產黨的分歧，第一在於國民黨推動階級合作，將地主階級、資產階級都包容在合作之列，而共產黨則推動階級鬥爭，要打倒

地主階級，將來條件成熟時還要消滅資產階級；第二在於國民黨企圖維護社會既定秩序，「和平解決」社會問題，而共產黨則要求搗毀舊的社會秩序，用「暴力」和「鬥爭」來改造中國。1927年蔣介石反共、「清黨」之後，兩黨各走各路，徹底決裂。中國共產黨轉入農村，「打土豪，分田地」，以強力破壞鄉村的地主所有制。後來國民黨人張繼、吳稚暉等指責中共領導的農民運動和土地革命是「奪產」或「搶產」運動，是「梁山泊強盜的老方法」，是「加些訓練，加些組織的『科學的』李自成，張獻忠的方法」。蔣介石則特別強調：「土地問題不能夠用暴力來解決。」

在解決城市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關係上，1932年9月30日，蔣介石在日記中提出，要實行「社會資本主義」，其內容是一種「改良資本主義」。1937年7月9日，蔣介石在廬山暑期訓練團講話，提出要「防止資本操縱」、「促進勞資合作，實施勞資仲裁」、「發達國家資本，保障私人企業」等。後來的歷史證明，國民黨實際上保護的是「官僚資本」。

1926年10月，北伐軍進軍湘鄂期間，為了減輕農民負擔，動員農民支援北伐，國民黨在廣州召開有大量左派參加的中央和各省區代表聯席會議，通過《最近政綱》，規定「減輕佃農田租的25%」，統稱「二五減租」。在廣州召開的會議不僅有許多國民黨人參加，有許多國民黨左派參加，中共也參加了。

1927年，蔣介石等在江浙地區發動「清黨」，成立了南京國民政府。其後，雖繼續標榜實行「二五減租」，但是真正實行過的只有浙江省。浙江省的「二五減租」幅度較大，佃農實際所得遠遠大於地主，自始就受到城鄉地主階



(左起)梁元生教授、楊天石教授、黃克武教授、王奇生教授(資料圖片)

級的強烈反對。1929年4月，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張靜江等人召開會議，攻擊「減租」辦法「有弊無利」，決定暫時取消。浙江省政府的決定遭到許多國民黨員和浙江省黨部的反對，問題上訴到國民黨中央，國民黨中央核准了浙江省政府的取消決定，明顯地表現出支持和袒護城鄉地主階級的態度。

在地主階級的強大壓力下，浙江全省八十多個縣裏，只有少數縣的部分區鄉實行過「二五減租」，大多數縣份仍是一潭死水，不見波紋。浙江省之外，其他各省均未實行，連裝模作樣的「減租」條文都沒有。國民黨僅存的改良主義火星，只是閃爍了一下，馬上就灰飛煙滅。抗戰勝利之後，國民黨重提「二五減租」，然而死灰難以再燃燒，連些微的火星也難以見到了。

「二五減租」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應該說是一個改良，但是全國只有浙江省做了，大部分省份都沒有做，連裝模作樣的一個條文都沒有，是甚麼原因？中國地主階級是一個歷史悠久、根深蒂固的強大社會力量。1932年12月23日，《蔣介石日記》云：「此時應積極剿匪，以求社會之安定。」國民黨要反共，除了依靠地主階級外，別無他途。當時中國的鄉村土地大部分為地主佔有，中國要進步、要發展，必須實行土地改革，改變這種狀況。然而，蔣介石卻要「求社會之安定」。這樣，他就必然要從改良主義進一步蛻化為保守主義，以維護和保持舊的社會秩序。那麼這裏我就回答了我的題目中的一個問題，原來孫中山在土地問題上是改良主義，國民黨最初在廣州開會的時候通過的「二五減租」也是一個改良主義的決定。由於取消了「二五減租」，而且蔣介石強調要保持社會的安定，所以這樣的話，國民黨就從原來的社會改良主義蛻化為社會保守主義。

國民黨在1927年「清黨」之後，其成員的階級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1940年11月8日，國民黨人唐縱曾訪問有過雙重黨籍的譚平山，討論如何挽救當時的政治危機。譚稱「救國必先救黨」，「必須清理黨的成份」。他說：「國民黨的黨員大都是地主、資本家、小資產階級，與三民主義的精神正好相反，何能望其執行三民主義之政策？」抗戰時期，四川一度發生過嚴重糧荒，國民黨人很多主張查封地主囤糧。唐縱在日記中感慨地寫道：「查封的事情，大致不會實行。我們的政策，依然放在資本家、地主、土豪劣紳基礎上，米荒的基本原因，是無法解消的。」米荒問題無法解決，其他改良主義當然更無法貫徹。

改良就是改革。一個社會能夠通過改良，不斷改革，革故鼎新，避免與暴力革命伴生的對社會的巨大衝擊和破壞，推動社會生產和歷史的有序發展，自然是好事。不斷改良，不斷革新，也就不斷進步。社會蒙受發展之益，而無代價過大之虞。否則，不斷革命，天天革命，社會將無寧日，也會走向進步和發展的反面。

改良和革命是如影隨形的弟兄。歷史的常例是：改良受阻，革命就會滋生。原來的改良主義者，或者向前發展成為革命派；或者堅持原有立場，反對革命，甚至成為舊秩序的保護者。其結果是，自己成為新的又一次革命的打倒對象。1949年2月，蔣介石隱退下野，回到老家奉化，發現當地四十餘年

毫無改革，痛感當政二十年，黨政機構守舊腐化，只重做官，不注意實行三民主義，「對於社會與民眾福利毫未着手」；因此，在日記中表示，以後要以民生為基礎，亡羊補牢。這則日記片段顯示，蔣介石終於認識到，由於國民黨未能堅持孫中山早就制定的改良主義方略，因而才招致中共革命的興起和自己的失敗，也預示着他在台灣要做某些改變。我的報告的簡要稿如上。那麼歡迎黃克武教授，歡迎王奇生教授批評指教，也希望在座的專家學者，諸位聽眾批評指教，謝謝大家。

## 二 國民黨左一點，共產黨右一點：二十世紀中期中國的三條道路

主持：謝謝楊教授。現在我們請黃克武教授發言，他的題目是「國民黨左一點，共產黨右一點：二十世紀中期中國的三條道路」，有請黃教授。

黃克武：金耀基先生、陳方正先生、梁其姿女士，還有今天的各位先生女士，各位來賓，我就接着剛才楊天石教授的話來展開我的一些討論。剛才楊先生談的主軸是國民黨怎樣從孫中山先生的社會改良主義轉向了社會保守主義，他認為核心的問題是國民黨的統治階級跟地主階級有明顯的重疊，因此浙江的「二五減租」沒有辦法推行，即使是改革的星星之火也灰飛煙滅。

我覺得楊先生的整個脈絡有一個潛台詞：他透過國民黨從改良主義到保守主義的蛻化來解釋1949年國民黨的失敗，認為1949年的失敗是因為二十年來沒有好好着手對社會問題的根本改革。這當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察，但是楊先生最後一句話也很有意思，蔣介石在台灣所推行的改革，包括教育改革，社會、政治、經濟的改革，還有最重要的土地改革，奠定了台灣政治、經濟發展的基礎。台灣吸取了「二五減租」的失敗，展開了「三七五減租」。台灣的「三七五減租」是一場非暴力、不流血、非常成功的土地革命。

回到楊先生的命題，我們可以發現，國民黨在浙江的失敗跟在台灣的成功其實是一體兩面。浙江的失敗是因為統治階級跟地主階級的重疊性，台灣的成功就是統治階級跟地主階級的分隔，使得國民黨在台灣能夠很順利地推動改革。但是，真正要解釋1949年國民黨的失敗跟共產黨的成功，國民黨內部的線索只是其中之一，如果我們不放在更廣的背景來看，光是這些解釋，可能只是一個單線的發展方向：第一，國民黨之所以從改良走向保守，其中很重要的背景是抗戰導致的國敵民凋，要重新收拾這種殘局要花很大功夫。雖然抗戰打贏了，但是抗戰所付出的各種各樣的代價不能忽略，這是國民黨最後倉皇逃離中國大陸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二，國際因素，特別是在美、蘇、德、英、日之間。國民黨跟美國的關係特別深，使得國民黨對於中共的政策受到了各種各樣的掣肘，使得國民黨沒有辦法好好談，也沒有辦法

好好打。這對國民黨的失敗是有決定性的影響的。第三，江山的成敗最後決定於軍事。國民黨一方面受到美國的掣肘，另一方面受到中共強大軍事力量的衝擊。如果我們從這幾個角度去看，可能會對中共1949年的成功跟國民黨1950年之後在臺灣土地改革的成功的相互關係有一個更密切的了解。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就是1949年的時刻。如果我們要解釋1949年的成敗，必須要看到二十世紀以來，中國歷史上的核心就是國共之爭、左右之爭，這樣的問題一直到今天還沒有完全解決。在二十世紀歷史上很多人都在左右之間搖擺，最有名的是蔣介石，他曾經是「紅色將軍」，訪蘇之後對於蘇俄非常嚮往。最近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的新書《蔣介石：失敗的勝利者》(*Victorious in Defeat: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iang Kai-shek, China, 1887-1975*)特別講蔣介石生命經驗中的俄國因素，他從親俄到疏離俄國到接近美國，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轉變。即使像蔣介石都有左右的搖擺，更不用說更具有代表意義的胡適，訪問俄國之後也曾經嚮往社會主義的理想，蔣介石跟胡適都是右派的代表性人物，而他們都曾在左右之間搖擺。二十世紀很多人都為「白色恐怖」、「紅色恐怖」付出了代價，如果從左右之爭來看，二十世紀的一個轉折點無疑是剛才楊先生所說的「四一二清黨」，這是一個反左的高潮，被殺的左傾份子大約是五千人，這是維基百科寫的，不知道統計上有沒有問題；也包括李大釗被絞刑、王國維自沉於昆明湖。最近我的同事李建民先生寫了《民國的痛苦：王國維與絕望的一九二七》一書，從情感史的角度去講1927年這種大動盪時代，對於思想、對於情感、對於當時的知識份子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壓力。王國維自覺地為痛苦而死，他不是殉清，也不是殉中國文化，而是殉他自己內在無法化解的痛苦。

相對來說，國民黨內部也有人反對「清黨」的做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在《顧孟餘的清高：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可能》一書中所講的國民黨左派。國民黨左派對蔣介石的暴力「清黨」是反對的，在4到7月跟陳獨秀和談，但後來發現中共背後有俄國的主謀者，所以7月15日開始分共。可是國民黨左派的分共是和平分共，一個人都沒有殺。我在書裏面特別講了這一段，它把不喜歡的人送走，包括把鮑羅廷(Mikhail Borodin)送回俄國，這是國民黨左派親共的和平手段。

1927年之後，如何處理國民黨內部的「反革命」，成為一個非常迫切的議題。1928年3月，國民政府公布了《暫行反革命治罪法》；10月有《共產黨人自首法》。翌年他們出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制度，就是《反省院組織條例》，改暴力殺伐為思想改造，從1928到1938年實行了十年。幾年前開始就有多篇論文寫各地的反省院，包括安徽的反省院、國民政府的反省院政策，台灣大學最近有一篇論文寫山西的反省院(梁文昶：〈中國國民黨對政治犯之改造：以山西反省院為例〉)。這些反省院基本上是把政治問題當作思想問題，在各地對所謂的「反革命份子」進行反省的教育，但是實行十年的反省院政策並不成功，延續到1950年之後就是台灣的「白色恐怖」。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沒有看《返校》

跟《流麻溝十五號》這兩部電影，我覺得非常好看。特別是《流麻溝十五號》，講女性的思想犯，非常有意思，而且畫面拍得很美，用一種溫柔敦厚的角度去談一個非常血腥的問題。

中共也同樣進行思想改造。我的同事余敏玲女士研究中共思想改造裏的俄國因素，她發現俄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是針對黨，但是在中共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批評自己的錯誤和他人隱蔽的行為，所以成為一個規訓黨員的辦法。同樣地，因為革命大局的要求，已不再採行肉體的絕滅，而一定要進行思想的改造，所以反覆要求寫自傳，檢討黨性，做深入靈魂的一種革命，一直到建國初期，這種改造的工作都在繼續進行。余敏玲的一本專書《形塑「新人」：中共宣傳與蘇聯經驗》就講了建國初期中共如何運用小說、教科書、歌曲、電影來塑造「新人」。但是中共的塑造似乎比國民黨要高明一點。怎麼講？我覺得中共改造靈魂的方式是強迫跟自願的結合，這個就高明了。國民黨的做法完全是強迫，反省院建立了十年都沒有辦法。

可不管怎麼樣，針對反革命，兩黨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二分法的政治選擇：真理只有一個，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不是壓迫就是被壓迫，不是革命就是反動，不是同志就是敵人，不是唯心就是唯物，不是資產階級就是社會主義的支持者。這種二分法是兩黨共同表現的特色，面對這樣的政治困局，導致最後1949年的抉擇必須要走向兵戎相見，沒有中間的道路，這就牽涉到我今天要講的主題——1948到1949年顧孟餘的「危樓」。顧孟餘在1948到1949年的《立報》寫了專欄，一共一百多篇，從裏面就可以看到顧孟餘很深刻的感受。這個感受跟陳克文先生的日記非常類似。

顧孟餘是北京大學的教授，後來加入國民黨，投入汪精衛身邊；1938年汪精衛出走之後，他又投向了蔣介石，所以也曾在左右之間搖擺。顧孟餘後來當過中央大學的校長。1948到1949年，國民黨曾經邀請他出來繼續幫助翁文灝，被他拒絕，反而在上海寫專欄，基本上就寫國民黨腐敗無能、經濟敗壞、民生凋敝。幾番的貨幣改革造成物價上漲，老百姓搶購物資，反而便宜了豪門，所以顧孟餘說感覺「危樓」快要塌了，這是他在1949年非常深刻的感受。他也提到陳布雷和戴季陶自殺的例子，認為這兩個人自殺預示國民黨江山將倒。在關鍵性的一種時刻，國共對峙、和戰問題，他覺得中國面臨一個歷史性的大悲劇。他在1949年初就預感：如果失敗之後，我們大家會同歸於盡。

就在這些專欄裏面，顧孟餘講到一個事情，就是我的標題所說的——「國民黨左一點，共產黨右一點」。這是1949年2月25日蔣介石下野之後，李宗仁在對湖南長沙各界演說裏提出來的，希望國民黨左一點，徹底地實行民生主義；共產黨右一點，實行溫和的革命。這種「左一點、右一點」的期望，是當時很多人的想法。但顧孟餘針對李宗仁「左一點、右一點」的期望說：國民黨不會左一點，國民黨是集落後保守倒退之大成，寄望於國民黨實行改革是不可能的。對於共產黨，顧孟餘認為要注意三點：第一點，共產黨背後有第三國際（共產國際）的導演；第二點，所謂共產黨政策就是毛澤東路線，其他路

線都死掉了；第三點，共產黨如果仍保有軍隊，實行溫和的革命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在1949年的時候就覺得「左一點、右一點」這兩條路基本上不可能。他提出了一個建議，希望國民黨能夠像英國工黨那樣實行不流血革命、進行財政改革、縮短貧富差距、建立社會安全制度、向富人巨額遺產者徵稅、壓低通貨膨脹、增加個人津貼。可是那個時候已經到了1949年4月，中共馬上就要渡江打過來了。

這群人後來到了香港，包括陳克文先生，變成了「第三勢力」的主力。為甚麼會有這樣的一種差異？民國初年以來其實有三個思想的方向，首先是右邊的國民黨，其次是左邊的共產黨。第三是胡適開始的自由主義，後來又加上新儒家，以及國共之外的一些人，1950年代之後他們在香港和台灣進行自由主義的努力，而以胡適、張君勱與顧孟餘為首。我覺得這三條道路代表三種不同的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社會學的想像力)，金耀基校長在這裏，我班門弄斧。我自己讀社會學，特別喜歡米爾斯 (C. Wright Mills) 的《社會學的想像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強調的是，個人的煩惱必須要連接到社會的公共議題，我覺得這三種路向有不同的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我們首先討論自由主義者的社會學想像。自由主義者從馬爾薩斯 (Thomas R. Malthus) 〈人口論〉(“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的角度出發，認為社會問題最後是人滿為患的問題，食物增長比不上人口增速；後又從馬爾薩斯〈人口論〉轉到社會達爾文主義，他們覺得人滿之後造成了生存價值對於文明價值的影響，而解決這個問題要靠人口政策跟社會政策。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想像是階級鬥爭論。他們採用一種狹義的階級論，認為階級關係就等於剝削關係，這跟廣義的「階級是一個社會群體」不一樣。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觀認為社會演變的核心議題就是剝削跟被剝削的關係，而且認為階級鬥爭是歷史的唯一原則。在這樣的邏輯之下，中共代表無產階級，而國民黨代表大地主跟中小資產階級，中國的革命就是被壓迫階級對於封建勢力的鬥爭。

至於國民黨的社會學想像是奠基於民生主義，反對階級鬥爭、強調階級合作、反對暴力、承認私有制，在具體政策上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和土地改革來從事社會改良。

這三種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是非常不同的，三股勢力最後湊不在一起，跟他們背後對於社會的不同想像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第三勢力都是反共反蔣的一群人，如桂系、汪派、偽滿洲國、中間小黨派，這群人不願意留在大陸，也不願意去台灣，而成為第三勢力的支持者。最近我特別喜歡看余英時先生的回憶錄，因為他那時剛好在香港，對於這一批人的內在心理有非常深刻的描繪。過去對於第三勢力的研究在香港似乎不受重視，但這其實是香港歷史資產裏面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尤其是1950、60年代，第三勢力非常密切地從事港台之間的合作。



陳方正先生特別要我整理陳克文先生跟台灣李樸生先生的通信，從通信就可以看得出來，當時港台對於國民黨和中共有意見的人是密切地結合在一起的。他們以台灣的《自由中國》和香港的《自由人》、《民主評論》作為反對中共「黨天下」和蔣介石「家天下」的重要言論機構，這是港台自由主義結合非常重要的一個面向，香港的言論在《自由中國》有很多轉載，而台灣作者在台灣不方便說的話，就投稿到《自由人》、《祖國周刊》、《民主評論》，等等。

港台之間有合作也有分歧。其中比較有意思的分歧可以從凌空在《祖國周刊》1955年的一篇文章〈介紹反共文化運動中的兩個學派〉顯示出來。這篇文章很有理論性的意涵，談到兩種自由主義：一種是台灣的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一種是香港《民主評論》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兩方最根本的差異就是對於儒家的認知。香港的自由主義者結合了對於傳統文化的肯定，牽涉到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錢穆這些人在香港的努力；而胡適、殷海光、雷震在台灣基本上是繼承「五四」民主科學的做法。所以凌空就寫了這樣一篇文章，徐復觀看着非常高興，他說：的確我們跟胡適的自由主義之間是有差距的。

這個差距我覺得是非常有意義的差距，可以從胡適跟唐君毅先生的差異之間看出來。胡適先生畢生強調民主與科學。1959年，胡先生跟唐先生共同到夏威夷去參加一個東西方哲學討論會，胡先生宣讀了一篇論文，是〈中國哲學裏的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The Scientific Spirit and Method in Chinese Philosophy”），認為中國哲學裏面最重要的就是有西方的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唐先生在同一個會議裏面宣讀的文章是〈中國哲學中的精神價值觀念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Ideas of Spiritual Value in Chinese Philosophy”），這就是後來他寫《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那本書的一個架構，兩個人看到了反共文化之外兩個不同的面向。上述細節大家可以看我的好朋友翟志成寫的《新儒家眼中的胡適》那本書。

值得一提的是唐君毅怎樣看胡適。唐君毅有一次在演講裏面講到：十多年前我在夏威夷開會，跟胡先生住在一起有一個月，我覺得這個人非常 human，很人性，很 social，非常社會，但他對於其他東西完全接不上，他說他自己沒有任何神秘的情調，我覺得胡適真是一個怪人。為甚麼完全沒有這種神秘的情調呢？從宗教的到形而上的，他完全沒有，他說根本沒有這個東西，他心目中的頭腦是科學的，我跟他有一些交往，不過後來也不管他了，當時我覺得我跟胡先生是格格不入。這裏可以看得出港台兩地自由主義一個大的差異，但是我覺得這個差異是一個有意義的差異。

我特別要講說余英時先生的例子，余先生非常仰慕胡適，當時他投了一篇文章到《自由中國》，被殷海光退稿。為甚麼被退稿？因為他說中國傳統裏面有民主的因子，殷海光一看根本就不成立，就把它退稿了。後來雷震先生很不好意思，親自向余先生表達歉意。可是不管怎麼樣，我覺得1950、60年代的港台第三勢力，有合作有競爭，他們反覆思考的一個問題，其實是二十世紀非常核心的問題，包括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係、自由與平等

的關係，還有傳統與現代的關係，這三個關係事實上是港台第三勢力討論的核心。

第三勢力大概到1960年代初期就失敗了，主要是因為反共必須要以武力為後盾。第三勢力基本上沒有一兵一卒，又失去了美國財政和軍事上的支持，只好黯然落幕。不過，1950到80年代第三勢力所代表的民主理想最後轉移到台灣的蔣氏政權，民主化之後的台灣離第三勢力的理想不遠。從這個角度來看，國民黨有沒有「左一點」呢？我覺得民主化之後的國民黨的確左了一點，主張言論自由，採取全民健保，主張性別平等，主張對殘障者的無障礙空間，保護少數民族的利益。相對來說，在大陸的共產黨在改革開放之後也右了一點。可是兩岸的體制價值還有很大的差異，40年代末「左一點、右一點」的理想顯然到今天還沒有成功。「一國兩制」可能是兩岸最大的一個公約數，可是當台灣人看到香港的例子之後，對於「一國兩制」有一點心寒。我最後用余英時講的話來做一個結束，他在這個自述裏面說：「在政治思想上，我是同情『第三勢力』的，因為我深信中國必須建立一個開放與寬容的民主體制，才能走向現代化的道路。」這是非常深層的一種反思，兩岸之間是不是會再度走向1949年的兵戎相見？我希望不會，但是這仍然要考驗中國人的智慧。謝謝。

### 三 小革命與大革命：國共兩黨的合作與競爭

主持：謝謝黃教授。現在我們請王奇生教授發言，他的題目是「小革命與大革命：國共兩黨的合作與競爭」，有請王教授。

王奇生：尊敬的金耀基教授，尊敬的陳方正教授、梁元生教授和梁其姿教授，尊敬的各位。剛才聽了楊天石教授和黃克武教授非常精彩的報告，各有不同的角度，他們所關注的重點是1927年以後，而我想重點關注一下1927年以前。

如果要用一個主題來概括，應該來講，中國的二十世紀是一個革命的世紀。如果從1894年孫中山成立興中會算起，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革命在中國持續了八十三年，在八十三年裏先後發生了三場革命，第一場是辛亥革命，第三場是共產革命，中間的第二場大家可能稍微陌生一點，當時叫國民革命，共產黨後來把它叫「大革命」。這三場革命中，第一場革命可以說是國民黨（前身）領導的，第三場是共產黨領導的。而中間的一場是國共兩黨共同進行的。值得注意的是，共產黨把中間的這場革命稱作「大革命」。我們知道，後來毛澤東把1966至1976年的運動稱作「文化大革命」。既然有「大革命」，相對應的是不是還有「小革命」？朱學勤先生將世界近代歷史上的革命，劃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以英美革命為代表的小革命模式，一種是以法俄革命為代表的大革命模式。如果按「大」、「小」來區分二十世紀中國的三場革命

的話，辛亥革命當屬「小革命」，共產革命當屬「大革命」，而中間的一場革命，則可以說是一場混合型革命，即國民黨的「小革命」（國民革命）與共產黨的「大革命」並舉，始於合作，繼而競爭，終至對抗。

甚麼是小革命模式，甚麼是大革命模式呢？簡而言之，小革命模式基本上是政治革命，而大革命模式則是在政治革命之上繼續進行社會革命，乃至文化革命。政治革命的邊界非常清晰，目標也比較明確——即在政治層面上顛覆最高權力，建立新的政權與新的政治制度。而社會革命則不止於此，用毛澤東的話講：我們的革命，「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奪取政權之後，還要繼續革命，不斷革命。所以社會革命是一個無限的革命，而政治革命是一個有限的革命。政治革命的目標比較明確，當革命「革」到社會和文化層面，目標就會模糊起來。社會革命究竟「革」到甚麼程度算完成？是非常模糊的。在以毛為代表的一代共產黨人的心目中，革命是沒有止境的。

1949年中共建立全國政權以後，繼續在社會層面上進行革命，在農村發動土改，在城市進行工商業改造，消滅地主，消滅資本家，之後又有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按理，在地主、資產階級消滅以後，革命的對象已經沒有了，但是革命還要繼續，因為在那一代革命家的心目中，革命是無比神聖的，革命是沒有止境的，最後發展到黨內自我革命。文化大革命某種意義上講是一場黨內的自我革命。毛認為黨內還會不斷產生資產階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以要不斷自我革命。不僅如此，毛還號召全國人民「靈魂深處鬧革命」、「狠鬥私字一閃念」。革命從政治進入到社會，又從社會進入到文化，最後從文化進入到靈魂。革命不斷推進。革命「革」到靈魂深處，既是極致，也是無底之深淵。

小革命是怎麼發展演變成大革命呢？因為時間的關係，我不往前面追溯得太遠，從甲午戰爭開始談。中國大陸學界通常認為，鴉片戰爭後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中國近代歷史的開端。其實鴉片戰爭失敗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朝野上下並沒有多少的危機感，但是甲午戰爭就不同了。甲午戰爭失敗以後，朝野上下普遍產生一種強烈的亡國滅種的焦慮。由於這種亡國滅種的焦慮，隨之而起的就是要「救亡圖存」。救亡圖存的背後，又是一種甚麼心態呢？急於求成的心態。因為國家都要亡了，種族都要滅了，所以要「救」，這一「救」的心態下的應對是「急」。一種持續幾十年的群體性的焦慮，導致整個民族的心態是急迫，急躁，急切，急進，急於求成，急不可耐，也急功近利。甲午以後，先是急匆匆搞變法，變法不成，又急匆匆搞立憲，立憲不成，又急匆匆搞革命，革命之後，又急匆匆搞議會政治，議會政治不成，又再起革命。

戊戌變法的失敗，很大的原因就是太急躁，太冒進，太急於求成。過去我們對清末的新政很少談，近些年大陸學者對清末新政的研究漸多。有學者指出，清末新政不是改革的力度太小，而是改革的力度太大了，從而加速了

清朝的滅亡。清季十年，朝廷可以說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廣度推行全面改革，比如1905年廢科舉。科舉制度在中國存在了一千三百年，但是在1905年就宣布廢除了。科舉的廢除，一下斷了所有讀書人的出路，從而使過去體制內的知識精英轉變為反體制的革命力量。廢科舉之後不久，清政府進一步嘗試立憲，被梁啟超稱作「開數千年未有之創局」。過去我們批評清政府的立憲沒有誠意，第一選擇君主立憲，第二設了九年的預備期，當時輿論覺得國家都要亡了，立憲居然還要九年的預備。今天回看，一個國家最高權力制度的根本性變革，九年的預備哪算長呢？後來清政府宣布將預備期縮短為五年，但五年也不行，革命直接把清政府推翻了。

民國建立後，立意學習西方最先進的制度，把國會、議會政治、多黨制都照搬過來。但1913年4月開始的第一屆國會開到第八個月的時候，輿論對國會卻是一片罵聲。過去我們認為國會的失敗是因為袁世凱關閉國會，其實輿論早在袁世凱關閉國會之前就已經把國會罵得一塌糊塗了。國會建立之前，輿論對國會寄予極高的期待，認為國會很神聖，是世界最先進的制度，只要國會一建，救亡圖存的問題就可以解決，但是沒想到國會建立以後天天吵架。國會是權力制衡的機關，不同黨派在國會的競爭本屬正常。當時人們指望國會救亡圖存，但國會確實無法承擔救亡圖存的功能，所以，國會運作幾個月以後，多數輿論就宣布這個制度不適合中國的國情。一個新的制度只嘗試幾個月就宣布它行不通，太急於求成了。過去我們高度肯定這種歷史緊迫感，但也要看到這種心態的負面效應。容不得深長計慮，容不得三思而行。一個又一個救亡方案，淺嘗即止，一個方案不見速效，即另謀出路。還沒有來得及認真總結前一個方案的成敗得失，新的方案又倉促付諸實施。與急迫相伴隨的是急進。

孫中山本來對議會政治寄予極高的期待，但他很快也失望了。然後他發起第二次革命，在1914年重新建立一個新的革命黨，叫中華革命黨，直接將「革命」作為黨的名字。過去我們認為孫中山晚年的重大轉變是1924年「以俄為師」，其實1914年建立中華革命黨的時候他已經轉變了。建立中華革命黨，意味着他完全拋棄了依託議會開展合法政治競爭的路徑。他要再次發動革命，而且認為這次革命要吸取辛亥革命的教訓，不能在革命成功以後就放棄政權，革命成功以後還要繼續革命、不斷革命。不過，孫中山的革命目標還限定在政治革命，亦即「小革命」的範疇。1917年7月，孫中山在一次演講中說，他在中國已發動了四次革命：一次革命為推倒滿清之專制；二次革命為反對袁世凱暗殺宋教仁；三次革命乃反對袁世凱推翻共和；四次革命為反對張勳復辟。這四次革命，均是政治層面的革命。

議會政治本是當時世界最先進的政治制度，在中國宣布行不通以後，就只好另謀出路，但另謀出路實際上是沒有出路。這個時候，俄國十月革命爆發，恰好為中國的革命者提供了一條新的道路選擇。國共兩黨同時選擇了「以俄為師」，這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一次重大的轉折。

五四前後，中國的思想界愈來愈激進。一方面，以新文化運動為代表，將中國的問題由政治制度轉向思想文化，認為中國的問題不是制度問題而是文化問題，走向「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不僅批判儒家文化，也要改造國民性，將辛亥以來的政治革命，升級為思想改造與文化革命。另一方面，五四以後，知識界幾乎都主張革命是救亡圖存的唯一出路。

革命也成了所有政黨的共同選擇。如果說清末的時候是革命派和改良派之爭，到了1920年代就成了多黨關於革命的競爭——國民黨要「國民革命」，共產黨要「共產革命」，中國青年黨也要「全民革命」。所有政黨在五四以後都轉向了革命，而且形成競爭關係，都聲稱自己的革命是最「革命」的。清末的改良與革命之爭到五四以後轉變為「革命與革命」之間的競爭。

這個狀態很快就進入到國民革命時期。1924年，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把蘇俄的一套黨、政、軍體制全部照搬過來，以後在蘇俄的指導下，與共產黨一起發動了國民革命。雖然孫中山在國民革命剛開始不久就去世了，但是革命還在進行。國民革命基本上是國民黨的小革命與共產黨的大革命的混合。國民黨要繼續推動政治革命，包括北伐戰爭，它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要推翻北洋政權，然後建立自己的政權。但是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後，在國民黨的旗幟之下開展社會革命，在農村發動農民運動，在城市進行工人運動。陳克文先生當時就是一個革命青年，擔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的秘書，後來到代部長，但實際上農民部、工人部背後還是共產黨主導。

這場革命最後造成兩黨分裂，某種意義來講是兩種不同革命道路的競爭與分裂，國民黨的革命是小革命，不主張搞大革命，而共產黨卻跟隨北伐戰爭的推進，在國民黨的佔領區推動社會革命，發起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兩黨在政治革命的層面具有同一性，但在社會革命的層面上具有異質性。因而兩黨在政治革命的層面可以攜手合作，卻在社會革命的層面分道揚鑣。北伐時期兩黨在「打倒列強除軍閥」的政治目標上高度一致，卻在是否深入開展農民運動與工人運動等社會目標上，一主緩進，一主急進。中共認為，國民革命只是社會革命的過渡。共產黨先幫助國民黨完成國民革命，然後再進行自己的社會革命。事實上，隨着北伐的推進，中共在國民黨佔領的廣東和兩湖地區大力開展以激進的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為中心的社會革命。這種激進的社會革命與國民黨相對溫和的政治革命之間很快產生了緊張關係。農民運動、工人運動直接衝擊了國民黨控制區域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穩定。中共的革命，本質上是「階級革命」。孫中山將其革命稱作「國民革命」，正意味着他對「階級革命」的不認同。孫中山從來沒說自己的黨代表甚麼階級。但中共以無產階級政黨自命，並認定國民黨為資產階級政黨。這意味着在中共革命的理念中，國民黨注定是其階級對手。所謂國共「合作」也注定只是暫時的而不可能長久。

1927年以後，國民黨愈來愈右，走向社會保守主義，共產黨則走向另一極端，愈來愈左。1927年是一個重大的分水嶺。國共分家後，國民黨獨自執掌政權，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從此不再革命。中共則繼續高舉革命大旗，先以「蘇維埃革命」和「土地革命」為號召，後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相標榜，1949年執政以後又很快宣布轉入「社會主義革命」，直至「文化大革命」結束才初步「告別」革命。

無論國民黨的小革命，還是共產黨的大革命，其領導力量均是知識份子。從革命與政治參與的視角觀察，二十世紀上半期的中國知識份子大體可分為五代：辛亥一代、五四一代、北伐一代、蘇區一代、抗戰一代。除辛亥一代與辛亥革命大致對應外，國民革命則匯聚了從辛亥至北伐三代知識份子；共產革命則匯聚了從五四至抗戰四代知識份子。值得注意的是，投身革命的五代知識份子中，北伐一代與蘇區一代的命運最為悲慘。這兩代知識份子有一共同的政治厄運：北伐知識青年遭遇了國民黨的「清黨」運動，蘇區知識青年遭遇了共產黨的「肅反」運動。1927至1928年間國民黨的「清黨」運動，大規模捕殺共產黨人，除數以萬計的共產黨知識青年被殺外，更有數以十萬計的國民黨左派知識青年被當作共產黨誤殺。同樣，1930至1932年前後中共在各蘇區普遍進行「肅反」運動，數以十萬計的中共黨員幹部被當作國民黨（「AB團」、「改組派」等）而誤殺。這兩場運動均在「革命」的名義下製造了二十世紀上半期中國革命中最为慘烈的兩大群體性冤假錯案。

據1928年7月中共六大的統計，1927年3月至1928年3月，共有337,568人被國民黨殺害，其中中共黨員26,454人。這意味着被殺者中，中共黨員只佔7.8%，尚有92.2%的被殺者不是共產黨。本人查閱大量相關資料後判斷，被殺者多是北伐時期加入國民黨的知識青年。

過去我們只注意到「清黨」對共產黨的打擊，其實「清黨」對國民黨自己的打擊更大。「清黨」前，國民黨黨員總數在100萬以上。「清黨」後，據1929年10月統計，國民黨黨員總數為65萬，減少約35萬。1924至1927年國共合作期間，兩黨在組織上有一種特殊的關係：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形成一種「黨內有黨」的關係；與此同時，中共在國民黨之外獨立存在，又是一種「黨外有黨」的關係。由於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宣傳部以及農民部、工人部等重要部門的領導職位一度由中共黨員擔任，國共關係逐漸形成國民黨掌控武力，共產黨掌控組織、宣傳和群眾組織的分工格局。一方面，在中共意識形態的強勢宣導下，國民黨知識青年黨員大批左傾。另一方面，由於中共控制了國民黨的組織，導致國民黨「清黨」時，分不清誰是共產黨，誰是國民黨。在無法分辨國共的情況下，一場聲勢兇猛的「清黨」運動不可避免地走向毫無節制的擴大化，從而導致大批國民黨左派知識青年被當作共產黨殺害。

國民黨暴力反共，迫使中共不得不建立職業革命武裝，「以武裝的革命反抗武裝的反革命」，並在若干農村區域建立蘇維埃革命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

鬥爭。這也意味着中共革命徹底轉入「階級革命」。在左傾激進路線主導下，「肅反」在各個蘇區全面展開並極端擴大化，製造出數以十萬計的冤假錯案。蘇區「肅反」到底錯殺了多少人，不僅今天的史家無法弄清，當年中共也不可能精確統計。有一個數據可供參考，即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對蘇區時期「肅反」錯殺人員的三次平反數字。第一次是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下發了〈關於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肅反中被錯殺者及其家屬處理問題的通知〉，按照通知精神，江西、福建、湖北等省平反了近2萬人。第二次是1956年，中央代表團訪問蘇區期間，為8,400多名被錯殺者平反。第三次是改革開放後，1983年國務院批轉民政部〈關於對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肅反中被錯殺人員的處理意見的通知〉，根據通知精神，各地進一步複查平反蘇區「肅反」被錯殺人員，此次全國總計平反近10萬人。三次平反共約12.8萬人。大規模的平反在相隔五十多年之後進行，記憶與舉證均非易事。被平反者多為五十多年後還有直系親屬並提出申訴者，而當年被「肅反」錯殺人員多是沒有成家的年輕人，也意味着沒有直系後人，故實際被錯殺人數當遠多於平反人數。

蘇區被錯殺的，大部分是知識青年。在中共的階級觀念中，地主、富農固然被認作必須消滅的敵對階級，知識份子也被認定為游移於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小資產階級」。由於知識份子絕大多數出身於地富家庭，這樣疊加的階級身份標籤，使知識份子在中共革命過程中容易成為懷疑、改造和清洗的對象。

國民黨的「清黨」與共產黨的「肅反」有一共同之點，即都以清除敵對勢力的名義大規模錯殺自己人。對國民黨而言，「清黨」運動實際上是一場黨內人才逆淘汰運動。不少真正有信仰、有理想、有革命熱情的黨員受清洗，被殺害。在「清黨」以後的相當一段時間裏，國民黨的整個組織系統幾乎處於癱瘓狀態。「肅反」對中共的自殘更是毀滅性的。毛澤東總結中共長征前的情形是「白區損失了百分之百，蘇區損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區的失敗主要緣於國共力量對比懸殊的客觀因素，而蘇區的失敗則主要緣於中共的主觀錯誤。主觀錯誤中，最嚴重的莫過於「肅反」。所幸抗戰爆發後，成千上萬的國統區知識青年奔赴延安和各根據地，正好填補蘇區「肅反」所造成的黨內知識份子之荒蕪。有人估算，整個抗戰時期投奔中共的知識青年共約三十萬人。這三十萬人在中共抗戰、解放戰爭，直至1950、60年代都起到了關鍵的作用，成為中共革命和建設的中堅力量。

## 四 討論與思辯

主持：謝謝王教授。接下來我們請梁元生教授為我們主持座談會，請四位教授到台前就座。

梁元生：各位朋友，我們今天聽過三位非常重要的演講，我的感受就是，歷史在不斷地迴盪，革命揮之不去。雖然有朋友說要告別革命，但是革命無論以甚麼形式出現，還是在我們中間產生影響，不單是近代史、現代史、當代史，甚至於我們的將來。

這個題目大概會激起很多人的情感。克武兄大概有一點浪漫主義的情感，奇生兄就有比較多的悲情出來。無論如何，今天這三個演講都是民國史權威的看法。楊先生講的是國民黨內部的競爭，最後從改良主義轉變成保守主義。黃克武跟着楊先生，對國民黨到台灣的變化多談了一點，對於「第三勢力」，特別是第三條道路在香港的地位，我希望大家多聽聽黃克武教授的意見。下面奇生兄就講共產主義。現在我們大概不用就此選擇了，但在其他地方都是競爭，早上我聽新聞報導，說中美的競爭 (competition)，然後變成 conflict (衝突)。最後怎麼樣？希望找一個 compromise (妥協)，就像我們這邊希望找一個 choice (選擇)，也是不同的道路。

我希望大家提出一些重要的、值得繼續思考的意見跟提問。

提問者：中國大陸有一句話，知識愈豐富愈反動，是甚麼意思？

梁元生：他是不是針對奇生兄來說的？

王奇生：對。不是說我反動，因為我知識有限。「知識愈多愈反動」，是文革時期流傳的一句話。其實共產黨的革命有內在的緊張，它的革命聲稱是無產階級革命，但革命的領導者實際是一幫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真正的無產階級是沒有能力領導革命的，因為真正的無產階級沒有多少文化，能力不夠，也沒辦法產生自己的信仰。所以不管是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共產革命，革命的領導者始終是知識份子。對國民黨來講，知識份子領導革命跟它的革命路線沒有甚麼緊張關係，但對共產黨來講就有緊張關係了，因為它的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但其領導人又都是資產階級，他們始終有一種革命的原罪感，認為首先要自我革命，所以中共有強大的自我革命的內在需求。中共早期領導人就說我們是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我們要無產階級化，所以這個過程裏面確有「知識愈多愈反動」的意識。正因「認為革命是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對象」這個背景，從中共的話語來講，知識愈多愈反動。我想它是這樣的一個觀念或者話語，我不知道說對了沒有。

提問者：您好，我的問題其實是跟着黃老師的書出來的。黃老師的書裏講的是第三條道路，但是老師講得比較多的是國民黨左派裏面出來的這些不認同蔣介石政策的人，不過共產黨原來也有一批人是不太認同1949年共產黨的政策，比如說托派的人，其中也有一部分到了香港。共產黨內部這些不認可1949年革命的一批人好像從來都沒被叫作「第三勢力」，不知道各位是怎麼想的？



梁元生：請克武兄再針對這個問題回答。

黃克武：您講得沒錯，在共產黨內部也有不認同主流思想的想法，包括托派跟香港的左派，他們不認同1949年之後的毛澤東路線，這部分人確實跟我這邊所談的第三勢力不在一起。因為第三勢力是從國民黨出來的，主要是國民黨內部反蔣的勢力，跟像張君勱這樣的少數黨派結合在一起。這些人所形成的整個系統基本上是反共的。第三勢力在反共反蔣的前提之下結合在一起，在這個前提之下，您講那批人是不跟第三勢力一起合作的。

提問者：三位老師都說到革命跟保守的關係，中共好像是一個非常「革命」的組織，但是在建政以後，毛澤東並不允許非常激進的社會革命。比方說文化大革命，他提出來的藍圖非常大，但是不允許成立全國組織；他提出了巴黎公社的原則，但後面又不能落實，而後成立的是軍政府；特別是「批林整風」以後革命徹底倒退回去，農村裏面也是「三自一包」，之前的革命承諾沒有去實現。我的問題就是，革命黨在奪取政權以後會不會蛻化成一個保守組織，這樣的蛻化是不是一個必然？

梁元生：一個政黨是否會蛻化成一個保守的組織？我想他問的是中共。

楊天石：一個政黨成立以後，發展起來了，是不是都要經過從改良到保守的歷程？我認為這不是一個普遍的規律。一個政黨成長了，掌握政權了，如果它能夠不斷改良，不斷改革，不斷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聯繫，緊跟歷史的腳步，那麼它是可以長期執政，而且不斷前進的。關鍵在於它能夠不斷革新，如此它就可以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裏面不斷改革，不斷進步，就不會從改良發展為保守主義，這不是一個普遍的規律。

梁元生：另外兩位講者可以講一下嗎？

黃克武：我講一下1949年之後的國民黨。剛才楊先生已經講到，在1949年之前，國民黨從一個有理想的政黨轉化為保守的勢力，其內部有一個階級矛盾的原因。到台灣之後，蔣介石深刻反省了這個問題。從蔣介石1949年到台灣到1975年過世，再到大概1970年之後蔣經國接班到1988年過世，一直到後來李登輝接班到1996年，國民黨其實是從「以俄為師」的政黨慢慢轉移成民主的政黨。以蔣經國先生為例，經國先生對於社會其實是有非常敏銳的感受。最近他的日記公布，就可以看出他在日記上很清楚地寫到：我們今天不從事改革、不從事革命的話，別人就要革我們的命。像剛才楊先生所說的，蔣經國非常有意識地看到時勢的一種改變，而能夠對應那種改變，走向了民主化的

道路。當然你也可以說他是被迫的，很多人說，因為地方選舉、因為反對勢力的壓迫。但是不管怎麼樣，他針對那樣的社會形勢而逐漸放寬腳步，推動適應社會的一種改良。但是比較弔詭的是，他走的是民主化的道路，而民主化之後國民黨就不執政了。所以我想一個政黨的發展其實是跟大的局勢有關的。

**王奇生：**我不講1949年以後中共在大陸的情況，我講講1949年以前國民黨的情況。在大陸時期執政的國民黨是「弱勢獨裁」。過去我們老是講國民黨專制獨裁，其實在1949年以前，它專制獨裁的力度還是有限，它真正實現高度的政治控制，是在1949年以後的台灣。國民黨在大陸執政的二十二年間，沒有真正統一和統治過全中國。抗戰前十年它真正控制的不過是江浙為中心的一部分地區，江浙之外，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是半控制，東北、西北、西南基本上沒能控制；抗戰時期大部分地區淪陷，國民黨遷到大西南，後來中共的根據地都不在它控制之下；抗戰結束了，更沒有恢復它在全國的統治。國民黨只是一個名義上的全國執政黨，真正的控制範圍是很有限的。

那麼在它的深度上，國民黨在抗戰之前，基本上它的政權浮在縣以上，縣以下基本上就沒有深入下去。過去我們講帝制時代「皇權不下縣」，國民黨也差不多。抗戰前國民黨的政權基本上也是不下縣，在1937年以前，縣長的平均任期只有八個月——清代知縣的平均任期是一年半，八個月的縣長他能幹甚麼？而且在抗戰之前，國民黨一個縣政府的正式編制只有八到十個人，同時期蘇區一個縣政府都有兩三百人，蘇區的一個鄉政府都有二三十人。國民黨的政權完全沒有下去，浮在上面。

但是1949年到台灣就不一樣了，國民黨真正實現專制獨裁統治是在1949年以後的台灣，「白色恐怖」很厲害。看王鼎鈞的回憶錄，他直到1980年代要離開台灣去美國，到上飛機之前還擔心特務會不會把他拉下來。

**提問者：**楊天石教授，您剛才說，國民黨沒能堅持孫中山主持制定的改良主義方略，沒再繼續田地的改革，但是1949年到台灣以後它都做了哪些改變，您能細說一下嗎？

**楊天石：**這個問題我在上一次報告裏曾經想談，但是由於時間的關係，匆匆忙忙沒有談透。剛才我講到，孫中山本來考慮到中國的農民問題，要推動平均地權，主張耕者有其田。當然，孫中山主張的耕者有其田，是和平土改，不是鬥爭土改，但是這個方針國民黨並沒有堅持貫徹下去。那麼在大革命時代，國民黨把原來孫中山的和平土改主張改變為「二五減租」，就是把佃農的負擔，從原來承擔的租地價格減少25%。我剛才講到，這一條綱領只有浙江省做了一兩年，一兩年之後，張靜江就把它取消了。當時國民黨的許多黨員表示要堅持「二五減租」，浙江省黨部和浙江省政府也有不同意見，省政府要

把「二五減租」取消，但是省黨部主張不能取消。這個官司打到哪兒去？一直打到南京的國民黨中央。國民黨中央研究了浙江省政府的意見，也研究了浙江省黨部的意見，最後國民黨中央認為浙江省政府的意見是合適的，批准了省政府的意見，把「二五減租」綱領取消了。所以我想，一個政黨要能夠不斷前進，不斷革新，有兩點很重要：一要緊跟時代的步伐，一要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在要不要堅持「二五減租」這個問題上面，國民黨中央恰恰聽的是地主階級的意見。

**提問者：**我想問王教授。您剛才提到國共兩黨對當時的知識份子都有一個錯誤的判斷，而且造成了比較嚴重的後果，但為甚麼還是沒能夠阻止後來一些比較激進的知識份子在抗戰期間到延安去，而國民黨卻有很多投機份子混進去，導致國民黨基層組織的潰散？

**王奇生：**抗戰時期知識青年投奔延安和中共根據地，情況比較複雜，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五四以後知識青年的激進主義思潮一直在澎湃。

**提問者：**想請教黃克武教授，請問您有沒有看過蔣介石訪俄的報告？他寫給廖仲愷的信，您有沒有看過？

**黃克武：**沒有看過，不過訪俄對他的一生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楊先生一定知道。

**提問者：**黃教授，我覺得研究歷史最重要的是努力看清未來，所以黃教授剛才的結尾給我一個很大啟發。這些第三勢力在以前是最不被看好的，反蔣反共，沒地盤、沒槍、沒人，就是一些落魄的人，構建了一個未來的規劃。但是我們突然發現，在幾十年之後的台灣好像是實現了。所以我在想，決定社會進步的力量是甚麼？包括第二國際、第三國際分裂的時候，結果是列寧派坐大，但是現在看第二國際被批判之後，在北歐差不多實現了。回到我們當下，比如說台海兩岸，大家各自感覺很好，同時又有衝突，帶來很多迷茫。從決定社會進步的力量來看，我們是不是也得稍微樂觀一點？三十年、五十年之後，這種民主、自由，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向現代國家和現代文明的轉型一定會成功的，可以這樣想像一下嗎？

**黃克武：**的確思想動員的力量其實影響蠻大的，這些人在1960年代的一些想法，慢慢地有一些實踐的可能性。兩岸的問題比較複雜，陳克文先生的日記或者顧孟餘的這些資料都看到，他們甚至懷疑說兩岸的分治可能要一兩百年。可是最後我還有信心，我覺得中華民族會走在一起。

**提問者：**楊天石教授剛剛談到，國民黨從改良主義蛻化為保守主義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是國民黨黨員的成份的一種變化。那麼蔣介石作為國民黨的最高領袖，他有沒有意識到國民黨自身存在的黨員成份惡化的問題，他有沒有嘗試過去改變甚麼？謝謝。

**黃克武：**我覺得只有到台灣之後，他才真正地改變。

**提問者：**我想提的問題就是蔣在大陸時期有沒有做過一些嘗試？

**王奇生：**我來替楊老師說吧，你這個問題也不是很複雜。其實我也不是很認同楊老師的看法，黨的成份其實不是關鍵的。你看看我的書，國民黨的「黨」真的不起多大作用，蔣介石最重視的是軍隊。關鍵是抓住軍隊，名義上是國民黨執政，實際上完全靠軍隊控制，所以黨的成份不是關鍵。

**提問者：**三位老師都談到了革命，不管是大革命、小革命，還是革命與改良，但是我想問啟蒙在哪裏？比如說前兩年去世的李澤厚有啟蒙與救亡的變奏一說，他的意思就是救亡壓倒了啟蒙。我想問，是不是這種社會危機、戰爭、國際危機導致個人的基本自由和權利，以及對個體的尊重，沒有提到很重要的議程上來？包括黃教授談到的第三條道路，是不是可以從啟蒙的角度重新再思考這個問題？

**黃克武：**我覺得您講的李澤厚先生關於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的確是一個觀察很敏銳的說法。奇生老師的演講摘要開始也講到，從啟蒙到革命再到社會主義的三個發展階段。的確，晚清是一個啟蒙開始的時期，甚至王德威會覺得晚清啟蒙的多元性超過了五四。可是晚清多元性的啟蒙到了辛亥革命，到了兩黨建立之後，整個啟蒙狹窄化。我寫梁啟超的書（《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也是這個意思，梁啟超所代表的那種自由主義的啟蒙，在面對「主義時代」時是被逐漸拋棄的。中國思想愈來愈激進，從政治革命到社會革命再到文化革命，而啟蒙恰恰是需要一個較平穩的環境，只有在一個平穩的環境，像1949年之後的台灣，啟蒙事業的推展才可以比較平順。

**梁元生：**李澤厚先生的那本書就是《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了，但是革命大概是不容易告別的，在三位的演講裏面，大概革命還是一個最重要的主流思潮，有點變奏，但還是主流的樂調。革命大概會繼續下去，用現在最流行的話說，sustainable developments（可持續發展）。

**提問者：**剛才我們已經說到啟蒙了，其實無論是左還是右，知識份子對救亡或者啟蒙探討時，有一點在我們講座裏面沒有提到。西方的執政黨其實有基

督教背景，我不知道在座的幾位教授，您認為在向現代化邁進的過程中，基督教信仰的元素在中國或者西方對社會的取向會有多少影響？

**黃克武**：這倒讓我想到張灝先生，我們最近編了張灝先生的紀念文集，書名叫做《幽暗已成千古患》，張灝先生在學術界最大的貢獻是提到「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其實幽暗意識是從基督教傳統來的，基督教傳統對於人性的深刻體認，讓我們正視用制度化來防治人性作惡的可能性，這是張灝先生所提出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我想這可以接上您所說的，基督教的背景跟現代國家建立的關係。

我打一個廣告，《幽暗已成千古患：張灝先生紀念文集》剛剛出版。張灝先生是近代思想史研究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所提出的幽暗意識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回答您所說的問題。宗教背景跟這種啟蒙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但張灝先生還考量，當把宗教背景帶回到中國傳統來的時候，我們怎麼看？他在宋明理學裏面找到一些元素。您講的沒有錯，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啟蒙絕對不是像胡適先生所講的那樣，是一個完全科學、機械性的東西，啟蒙的背後還有深層的、形上的宗教因素。

**梁元生**：這個問題很具體，我們在研究基督教進入中國的時候，有一個美國的歷史學家叫魯珍晞 (Jessie G. Lutz)，說國民黨是一個青年會黨，青年會是基督教的一個團體，它的總幹事跟學生幹事在全國分布很廣。1928年國民政府的內閣一共有十個人，其中有八個是青年會背景的。不用說老蔣跟他的夫人了，最近的研究表示，中共元老很多從地下黨的時期開始就跟基督教有關，包括有一部分是牧師，可以多做研究。

**黃克武**：對，我們近史所編了一本《五四運動與中國宗教的調適與發展》，裏面有非常深刻的討論。在現代化過程裏面，民主、科學跟宗教有着非常複雜的關係，包括您講的「紅色基督徒」。

**梁元生**：革命在迴盪，現在的歷史在我們當中還是會繼續下去的。謝謝各位，謝謝三位講者。

**楊天石**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史哲學部榮譽學部委員、研究生院教授、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黃克武**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王奇生** 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兼歷史系主任